

# 孔孟的仁說

沈清松

孔子在提出「仁」的哲學之時，正面對著當時周朝的典章制度走向衰敗的時代，也就是所謂「周禮衰微」、「周文疲弊」的時代。其實，孔子本人是十分嚮往周代的禮樂、制度的，他嘗說：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。」又說：「久矣，吾不復夢見周公。」周公制禮作樂，使得周代的人有了十分完備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，正是所謂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。」但是到了孔子的時代，這些制度和規範已趨衰微，不易發生作用。這種情形有一點類似我們這個時代，雖有社會

規範，但脫序之事不斷發生；雖有法律制度，但違法之舉層出不窮。在孔子當時，他認為制度和規範之所以衰微，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一方面它們被外在化、形式化了；另一方面則在於人在履行規範的時候，內心根本沒有什麼感覺。孔子爲了使周禮，也就是周代的儀節、規範和制度，能夠再度恢復活力，因而致力喚醒人內心對自己、對別人、對事物的相通之情。

禮節與規範的危機在於形式化、表面化。爲此，孔子說：「禮乎禮乎，玉帛云乎哉；樂乎樂乎，鐘鼓云乎哉。」禮並不只是玉帛禮器；樂也不只是敲鐘打鼓。孔子說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；人而不仁，如樂何。」換言之，人如果在行禮奏樂之時，心中沒有任何感受或感動，那就是毫無禮樂可言。面對由於禮樂的形式化、表面化所造成的危機，孔子



是提倡「仁」，就是要大家恢復內在的感通。有感通，斯爲仁，沒感通，則是麻木不仁。帶著內心的感通，去行禮儀、守規範、立制度，就可以使周禮再次恢復其生命力，這就是孔子提出仁說的原初構想。

對人對物能感通，則能體知生命，愛惜生命，對人對物自會有一份尊重，並因此而生出應有的分寸。由於心中有尊重、守分寸，當然也就能遵守行爲規範，在秩序中體現美感。感通與惜生，仁也；尊重與分寸，義也；秩序與美感，禮也。至於能在自覺中致感通，在尊重中生分寸，在條理中得秩序，則是智的作用。仁、義、禮、智是儒家重視的重要德行。

亞聖孟子認爲德行的陶成最重要，而所謂德行是人原有向善之性獲致發展，以至於實現的美好狀態。他認爲人的向

善之性呈現在人的善心之中，而以惻隱之心、羞惡之心、辭讓之心、是非之心四者爲仁、義、禮、智之四端，並認爲人若能加以擴充，善盡其性，就可以成就仁、義、禮、智四種德性。孟子說：

「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，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。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由是觀之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」

孟子在這裡指出，惻隱之心是人本有的善心，是會自然而然地發用的，一旦遇上任何相關的事件，便可以深切地感受到。就如同我們猛然間看到一個幼兒立刻將要掉進井裡



心裡馬上就會感到關切、同情、驚異，並且心中立刻有趕過去救援的衝動。這完全是發自內心，而不是爲了結交這小孩的父母，或爲了想在社區裡面邀功釣譽，也不是因爲小孩子的哭叫聲令我感到厭煩，乾脆救了他了事，免得囉嗦。在自然而然地感到關切、同情和立刻趕往救人的時刻，是想不到這一切外在的、庸俗的或自私的念頭的。孟子認爲，只要我把握住這本有善心，加以擴充發展，就可以實現德行。爲此孟子說：

「凡有四端於我者，智皆擴而充之矣。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」

「人皆有所不忍，達之於其所忍，仁也。人皆有所不爲，達之於其所爲，義也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

用也。人能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」

由此可見，不忍之心，不想害人之心，是人本來就有的，如果能將它加以擴充發展，就可以成就仁的德性；人人都知道不應該偷偷穿越他人的圍牆，如果把這羞惡之心加以擴充，便可以成就義的德行。如果我們能把本有善心一一加以擴充，就像火開始燃燒，泉水開始湧出一般，就可以在自己身上，成就仁、義、禮、智四種美德。

從以上對孔子和孟子的觀點的詮釋，我們可以得知，所謂的仁民愛物，並不只是一種不得不遵守的道德規範，而是立基於人與人、人與物之間的內在感通，此種感通尤其表現在人的本有善心，如果能夠加以充份發展，就可以成就德行。可見，「仁民愛物」也是一種美德，是人本有善心的充量實現，千萬不要把它當作只是一種道德義務而已。



## 仁爲諸德之本

更重要的是，以上的分析顯示，仁愛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德行。在儒家思想中，「仁」是與「義」、「禮」、「智」等美德相關聯的，而且是諸德之本。這表示一個人單只有仁愛是不足的，他必須以仁愛爲本，發展出其他許多的德行，這樣人性才能夠獲得更爲完整的實現。

首先，仁當然是最重要的。仁是根源於人的不忍人之心，是惻隱之心的發展與實現。換言之，仁就是人與人之間，人與自然之間的相感相通。因爲對自然有感通，所以人面對自然中的良辰美景，內心自會感到心曠神怡，生出許多感動。文人雅士，面對自然而興發詩意，所以能「感時花濺淚」、「悠然見南山」。就現代人而言，因爲對自然有感通，所

以就會愛好自然，不忍加以污染，卻能注意生態的平衡、維護自然環境，使青山常在、綠水長流。更因爲對人有感通，所以身爲常人亦能與別人分憂、與友人同樂；身爲官員則能體民疾苦，了解人民的需要。在官僚制度日愈發展的現代社會中，人際關係日愈冷漠，公務人員往往在處事的時候採取對事不對人的原則，因而往往變得不通情理。如果能恢復內心的感通之力，則一方面既能合乎現代化制度的要求，另一方面也比較會通情達理。

其次，由於能與人、自然有所感通，自會生出尊重，並且心中有了分寸，不會任意踰越，而這就是所謂「義」的本意。義者，宜也，也就是行其所當行。光說仁愛，往往流於空泛，必心中有分寸，行其所當行，仁始得以落實。但是，何者當行，則不易明確地規定，因而往往滋生誤會。例如

## 孔子學術思想專輯





般人或江湖中人，以為「有恩報恩，有仇報仇」、「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」就是義，其實這是以報復為義，是十分狹隘的想法。再進一步，則以為公道就是義，認為對權力或財富加以公平分配，或分配給每一個人應得的一份就是義，這是所謂的「分配之義」，在現代社會中最為重要。然而，義的道理並不窮盡於分配的正義或公道，最徹底的義，是在於「道德之義」，旨在尊重每一個人自我實現的權利和每一個人的尊嚴。社會上往往由於對人對物沒有尊重，以致未能分給他人應得的一份，因而有失公道；進而由於有失公道，以致造成傷害，而引起報復。

可見，由於對人對物有仁有愛，因而能生出尊重，自有分寸；由於對人有尊重，才會進一步引申出真正的公道；無失於公道，自亦不會引起報復。這就是「由仁生義」的道理。

再次，由於心中有了分寸，便會進退有節，舉止有禮。

所謂「禮」，在古代中國原指祭祀的儀節，亦可引申為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。在中國人的心目中，這些儀節、制度和規範，代表了一種整體的文化理想，欲在秩序和美感之中，使個人和團體的生活變得有節奏，有意義。這就是為什麼孔子會推崇周禮的理由。周朝有冠、昏、喪、射、御、朝、聘諸禮；此外，飲食、迎送、揖讓、授受、拜跪、坐立行走、相見執摯，皆各有俗。禮俗的建立，也正是為了形塑個人和團體生活中的秩序和美感。

從個人的日常禮貌、行為規範、生命禮俗，到社會中的倫理規範、時序節慶，無一不是禮。禮是外在形式雖然可以隨時代和社會的變遷而改變，然而人的生活必須有禮，則是不變的原則。



可見，不但由仁愛可以生出分寸；而且進一步，由分寸也可以生出秩序和美感，這就是「由義生禮」的道理。

最後，仁、義、禮的把握，需要智的運用。所謂智，最粗淺的意思，就是在於收藏知識，知識包含了對外物的知識和對人事的知識。用今天的話來說，對外物的知識是指科技之知；對人事的知識則是人文社會之知。《大學》有言：「致知在格物」，是爲了格物之性，以便盡物之性。再進一步，智的深一層意義，則在於達成自覺，即所謂「致良知」。良知所知者，乃是在己內有「分寸」、能「感通」之本性，藉著分寸與感通，而達致盡己之性。再更進一步，由於感通天地萬物，因而能認識天命。於是「智」的最高意義，便在於認識天命。爲此，《中庸》說：「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」知物、知人、知天，就是智的內涵。《中庸》又說：

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盡其性，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」從盡己之性到盡人之性、到盡物之性，乃至達致天命，歸根結底，都是來自於仁愛的感通。

用今天的話來說，中國文化所嚮往的理想的人文科學，是爲了瞭解人的自我，達到盡己之性；理想的社會科學，是爲了瞭解社會群體，達到盡人之性；理想的自然科學，是爲了瞭解自然法則，達到盡物之性。智可以形成科學，但就中國文化而言，科學本身也可以溯源自仁民愛物的精神。仁民愛物精神的發揮，甚至可以主導科學發展。

仁民愛物是一個根源性的態度、能力和美德，從這裡可以發展出其它的能力和美德，也可以張舉出中國文化的其他內涵。仁愛真可謂諸德之本。

